

宏观视野下的精细之作

——简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宋志勇

近代日本(1868—1945)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曾经以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来实现其由“大陆政策”而“大东亚共荣圈”的对外政策目标,留给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许多惨痛的历史记忆。因此,战后60多年以来,关于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不但在日本,在我国学界亦是由来已久、成果频出。仅在最近几年,就有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大著问世。此外,作为近代日本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之主要内容的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更是成果斐然。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指出:相对于日本学者大多偏重于微观实证的研究成果而言,我国学者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宏观整体性的成果居多;由于近代日本留给亚太地区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历史遗产,我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武器的批判”;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日本侵华的部分,而对于日本整体对外政策即亚太政策的研究不够,已有成果基本上还是片段的、个别的研究,如“大陆政策”、“南进政策”、“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如何立足于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宏观视野,对于作为其亚太政策集中体现的“十五年战争”期间(1931—1945)日本从“大陆政策”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演变过程,继续进行微观精细而实证的研究,在我国史学界仍然显得尤为必要和急需。惟其如此,臧运祜的新著《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界在上述方面研究的不足,故值得重视和推介。

—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原为作者10年以前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之主体部分。作者在我国已故的著名亚太区域史专家何芳川教授的指导下,又利用近年多次赴日访问的机会,历时8年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可谓是一部“十年磨一剑”的精心之作。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两章构成,主要简述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初步实施的历史过程;下篇则由三章组成,重点论述日本在“十五年战争”期间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过程。从全书的内容结构和布局分量上看,著者实际上是立足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宏观视野,而着重对于“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进行精细的历史过程的纵向研究。

与一般著作的“前言”有较大不同的是,作者在本书的“前言”部分,不惜以大量的笔墨,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评析了关于本课题的中、日两国学术研究的“前史”,从而为本书的立论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确定了适当的定位。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是简单的照搬或批评,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细致的分析,取其所长,补其不足。对涉及到的所有重大问题,在对国内外的相关先行研

究进行详细评介的同时,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于“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等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细致而到位,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客观的学术研究“前史”,表现出了一个历史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研究功底。

其实对于所有的学者而言,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定位自己的研究,也就是在为自己的成果如何创新而寻找突破口。对于历史学而言,这样的“前史”性的基础工作,尤其必要和必需。否则,不但自己的成果将事倍而功半,而且极有可能陷入炒干饭式的重复论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的日本近代史、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研究,类似这样的忽视前人、近人乃至日本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成果”,还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尽管作者的“前史”总结系个人之见,被总结的他人也将不无商榷之处,但对于历史学的创新研究而言,本书的方法也是值得提倡的。

作者还在“前言”中对于相关学术概念进行了辨析,并着重对于历史上的“大陆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作者认同国内外学界关于上述两个概念是“历史用语”而非“学术用语”的观点,进而指出:“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仍然仍以‘大陆政策’与‘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历史用语’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在学术上则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此,作者通过自己的细致分析,认为用“亚太政策”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比较合理。

该书作者的这种概念辨析,并非无的放矢。众所周知,日本这个“小国”,在近代历史上,不但有着“大日本帝国”的梦想,而且有其明确的战略与政策。对于这样的战略和政策目标,如果仅用战前惯用的“大陆政策”或“南进政策”,以及战后学界常有的“东亚”来概括,显然不足;但如果要沿用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则难以为学界和世人所接受。因此,作者考虑到战后1970年代以来日本政、经、学界盛行的“亚太”(“アジア・太平洋”)概念,以及1980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关于十五年亚太战争史(“アジア・太平洋”或“アジア太平洋”战争)的术语,而采用了较为规范的“亚太政策”这个概念术语。对此,学界或许言人人殊,但笔者认为还是恰当的。这就如同“历史”和“历史学”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历史学者应该有自己独到的对于“历史”的见解。

二

本书上篇第一章,简要论述了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亚太政策基本形成的背景及其过程。为了说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历史连续性,本章把“历史”上溯到了古代,阐述了古代日本的对外思想与行动,以及幕末时期的对外思想。但是,重点在于论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对东亚的外交政策及其侵略行动,包括对台湾、琉球、朝鲜的侵略等内容,并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及该期间作为日本亚太政策之核心的大陆政策。明治时代的45年,是日本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当然也是日本对外政策上的奠基、开局时代。鉴于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甚多,本书紧紧围绕亚太政策这个核心论题来展开,勾勒出了明治时代在近代日本对外政策上“承先”、“启后”的历史特色。而对于前近代的日本式华夷秩序、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及其标志等在中日学界迄今尚有争论性的重大历史问题,作者也不避锋芒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章简述了大正到昭和初年(1912—1930)日本亚太政策的初步实施过程。相对于此前的“明治时代”和此后的“昭和战前期”,中、日学界对1910—1920年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素来较为冷寂和薄弱。本章则为我们描述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初步实施亚太政策的历史过程。不同于迄今已有研究成果的是:1. 作者认为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北上、南下,分别从“大陆

政策”和“南进政策”两个方面,初步实施了亚太政策,并因此成为亚太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2. 作者指出日本在一战之后,虽然被迫就范于“华盛顿体系”,基本上维持了“协调外交”政策,但其亚太政策的锋芒仍然时有暴露,那就是1921、1927年召开的两次“东方会议”以及1929年设立的“拓务省”,这是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近因。相较于我国学者更多地强调“远因”上的“明治遗策”以及所谓“田中奏折”的问题,作者在上述方面的研究见解,应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较大的创新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

本书的重头戏在下篇。作者分为三章,分别详细论述了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系统论证了日本挑战华盛顿秩序、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实现“大陆政策”,发动“大东亚战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以至最终崩溃的历史过程。

1931—1945年的“昭和战前期”即十五年亚太战争史的观点,经过战后50多年来的争论,目前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见解。明显地受其影响,我国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讨论,目前也基本确立了“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的见解。作者虽然明确地提出不赞同后者的见解^①,但也接受了日本学界的上述主流看法。本书还从日本亚太政策演变的宏观角度考虑,对于“十五年亚太战争史”提出了新的阶段划分,即将1931—1935年为第一阶段,1936—1940年为第二阶段,1941—1945年为第三阶段。在这其中的第一、二两阶段,我国学界一般是将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其阶段转换的标志。但是,作者除了考虑“华北事变”的因素外,还考虑到了日本“以台湾与中国华南为基地酝酿继续实施南进的开始”这个重要的因素,并且特别强调了1936年日本法西斯主义化之下广田弘毅内阁8月制定的一系列国策的重要象征意义,从而将1935—1936年作为阶段转换的标志,这是以往学界不甚重视之处。

作者在下篇三章的有关研究,对于迄今的日本“十五年战争史”或中国“十四年抗战史”,尚有如下的参考价值:

(一)结构合理、系统性强。本书着眼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演变的动态过程之分析与论述,将其归纳为基本形成、初步实施、全面实施三个时期,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了全过程。这其中既有对其政策形成的理论探讨,也有全面的过程叙述。特别是其核心部分,对于十五年战争时期日本亚太政策的论述,全面、系统、深入。作者从对华政策到对苏美政策,从大陆政策到南进政策,从“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把日本上述错综复杂的亚太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表现出了该书的研究深度,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于“十五年战争史”的认识。

(二)注重利用第一手史料,使本书成为目前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原始档案资料使用最为丰富的著述。本书下篇除了使用日本外务省档案、陆海军档案(缩微胶卷)等资料外,还利用了作者多次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图书馆等处搜集到的“外务省记录”、“陆海军文书”以及新近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本书的立论、观点,建立在了牢固的史实基础上。特别是在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重大国家决策的形成上,都有可靠的史实依据

^① 实际上,中国史学界对于“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问题,迄今仍有争议。参见:张振鹗《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王桂林《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49页。

和源于这些依据的分析,使其研究得以深入。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华北政策的形成上,使用了大量的日本外交档案,论证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是如何协调完成对华北政策的,使得该过程清晰可见,分析有理有据。再如对1933年《塘沽协定》后中日华北善后问题的北平交涉,系统挖掘利用了《日本外务省档案》等第一手资料,查明了该交涉的详细过程,进而得出的结论认为:北平会谈“不但扩大了日本在《塘沽协定》中已得和未得的在华北的特权,而且又以继续进行通商、交通、通信等方面的善后谈判,开启了实际承认伪满的大门。北平会谈形成的记录,虽未履行签字、换文等手续,但事实上是《塘沽协定》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评价客观、中肯。

(三)研究方法上以历史研究法为主,同时兼取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使本书缜密的实证研究与广域的宏观研究有机结合,既能反映整个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全貌,又能理清不同阶段日本外交决策的特征。本书重点围绕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决策内容等方面,来考察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过程。在我国学界以往的有关研究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即为了说明日本的对外政策,往往将某一位日本政府的对决策实际并无太大影响的低级官员或军部低级军官甚至一些知识分子的意见,作为日本政府的决策来看待,把日本政府复杂的决策机制和过程简单化,因而难有说服力。而该书既有对日本重大决策过程进行的宏观考察,又注意对问题的具体分析,将真正影响国家决策的政府意见、军部意见、舆论压力进行梳理,分析他们在国家决策中所具有的作用,以及形成最终国家意志的过程,使读者看到了真实的、复杂而有序的战时日本国家政策决定的体制及其过程。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深化日本的对外政策和战争责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本书作为我国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专著,对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历史特征的概括,代表了我国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①作者通过全书的纵向性的动态论述,特别是十五年战争期间的深入研究,在“结论”部分对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进行了横向性的静态考察,并总结出如下历史特征:1.从政策内容的构成上看,是以侵华的大陆政策为主。2.从政策内容的实质上看,是以殖民主义为主。3.从政策实施的程序上看,是以“渐进”为主。4.从政策实施的手段上看,是以不断的武力征伐和侵略战争为主。5.从政策追求的目标上看,主要是在与欧美列强的合作与竞争中,建立亚太地区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概括,既全面而又有深度,很有说服力地揭露了近代以来日本亚太政策的本质及其作为必须否定的近代日本历史遗产的负面效应。除了上述学术意义之外,本书的研究结论对于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根本性“历史问题”上并未认真反省的当代日本,也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

诚然,笔者也要指出本书仍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就全书的研究角度和力量的平衡问题而言,虽然作者力求跳出“日本对华侵略史”的圈子,从更广阔的“亚太”视角展开研究,但从内容的构成上看,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比重还是过于庞大,而“亚太”的成分则明显不足;对日本的对苏关系、对英关系述及过简,日美关系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对作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之重要一翼的“南进政策”,作者只是论述了该政策的演变过程,而对日本在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的实施过程及其应有的历史事实,则基本上缺乏论述;关于日

^① 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1996年开始进行“211工程”建设项目“亚太地区史”,其阶段性研究成果,参见米庆余、王晓德主编《近代现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本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政策,也没有涉及。而在上述方面,日本学界已经具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我国学界也有一些成果可以作为参考。笔者可以谅解作者作为“中国史”学者的苦衷和在“世界史”研究中的难度,但如果作为一部名实相符的专著,却又不能不指出本书的这种缺憾。当然,如果作者采取不少日本学者所惯用的在一个大题目之下加注“以……为中心”的书名标题,也许就会万事大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任何一部大作,都并非是面面俱到而无懈可击的了。

在对史料的使用上,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推敲的余地。由于本书的重点在于以第一手资料论述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比较而言,作者在对明治、大正时代亚太政策的研究上,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运用就明显薄弱。在这方面,不但有大量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的资料可以运用,而且相当多的重要军政人物都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作者完全可以选取其中最重要的史料加以集中运用。而在“十五年战争史”研究方面,作者对于个别史实的叙述,不厌其烦,并因其史料使用过细而在理论上的概括明显不足,使读者如坠雾里。

在近代的亚太地区,除日本之外,欧美列强中的美、英、苏等国,也都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些国家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例如最重要的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①,完全可以与同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作者将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同这些亚太大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话,相信本书的结论部分将会更加富有说服力。

还是那句“瑕不掩瑜”的老话。该书的出版,不仅为我国日本近代史及亚太区域史的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开拓了视野,并对我们观察当今日本的亚太政策有所裨益,值得国内学界同仁加以关注。

(作者 宋志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宋强、秦志:《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